

1950年代冷战结构下 国共两阵营对日本华侨展开的争夺战

陈来幸

摘要：冷战期间，国共两党之间在海外的竞争围绕争夺华侨学校展开得最激烈。在日本，现有的五所全日制华文学校分别被标记为北京派和台湾派的原因，是源于1950年代的战斗的结果。

在二战期间不得已被关闭的各地华侨学校，在二战结束后立即重新开办。在此期间，由于内战而撤离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都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和管理贸易的体系。因此，通过授予在日本的华侨进口香蕉和出口苹果的特权，台湾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得以介入华侨社会。

由于1952年的学校事件而导致横滨中华学校分裂。次年，台湾政府向东京中华学校发动人事介入并于1956年对董事会进行了重组之后，台湾政府继续试图干预华侨社会。1958-59年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校舍重建运动终于是放弃台湾政府的支持和指导，而是采用了自立更生的重建方式。本文讨论了神户中华同文学校重建之前进行的大阪中华学校重建问题，验证了通过台湾香蕉进口特权所获得的收益，实现了大阪中华学校的重建。需要指出的是，东京、横滨、大阪、和神户的华侨学校的重建和扩建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在此期间，尽管重申了华侨以往是采用政治“中立”的自主路线独立运营华侨学校的传统，但当时日本各地的华侨学校，均受政府补贴等资源的影响，各地华侨学校之间存在着互相竞争的关系。

序 言

1945年二战的结束给整个东亚地区带来了结构性变化。中国大陆国共内战的日趋激化、盟军占领日本、朝鲜半岛的解放与独立都引起了东亚各地区战后社会的巨大变动。至于1949年北京政府的成立和“国府迁台”，继而爆发的朝鲜战争，美军派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导致东亚冷战一大格局的出现。1954年-1955年初和1958年的两次金门炮战，揭露了50年代在冷战体制下国共双方政府对立局势面临的危机。本文将重点放在1952年以后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在日本展开的华侨学校的争夺，试图对中外学者尚未整理清楚的战后日本华侨社会，做一下梳理。

近年来，由于台湾方面政府档案全面公开，战后日本华侨的研究也开始逐步兴起。同时，日本华侨社会内部的报刊资料陆续被发掘。战后一段时期在日本出版的众多报刊以Prange (Gordon William Prange)文库之名，早已供学者利用¹。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收藏的盟军(GHQ/SCAP)档案亦受关注已久。此外，由于改革开放后的条件改善，在50年代当时终于“回”大陆的在日华侨运动积极分子，包括台湾人，如杨春松、韩庆愈、郭承敏等撰写的传记、回忆录也陆续公开出版²。学者对老华侨进行口述历史，其成果也逐步公开出版³。

-
- 1 有关留日华侨和留日学生的研究成果收编于大里浩秋编《战后日本と中国・朝鮮——プランゲ文库を一つの手がかりとして》，东京：研文出版，2013年。
 - 2 杨国光《ある台湾人の軌迹——杨春松とその时代》，东京：露满堂，1999年、韩庆愈《留日七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大类善启《ある华侨の战后日中关系史——日中交流のはざまに生きた韩庆愈》，东京：明石书房，2014年、郭承敏《ある台湾人の数奇な生涯》，东京：明文书房，2014年、《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03年等。
 - 3 神阪京口述记录研究会《聞き書き・关西华侨のライフヒストリー》，神戸：神戸华侨历史博物馆，2008年刊行第1号直到2020年的第10号、中华会馆、横滨开港资料馆编《横滨华侨の记忆：横滨华侨口述历史记录集》，横滨：中华会馆，2010年，等。

关于这些领域,台湾学界何义麟⁴、许琼丰⁵、杨子震⁶等已有相当丰硕的学术成果。在日本学界,老侨团人士共同出版的《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陈焜旺主编,日本侨报社,2004年)问世后,除了笔者发表的几篇论文之外,还有大里浩秋、孙安石、川岛真、王雪萍等特别关注留日学生的活动,编辑出版了不少成果⁷。王雪萍利用中方资料指出以廖承志为主的大陆“知日派”人士的重要性,从共产党知日派的角度来探讨他们推行的对日华侨与留学生政策⁸。安井三吉根据访谈和积累在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资料室的报刊以及国内外档案,最近撰写了《神户华侨联谊会史纲(1957-1976)》⁹。

笔者曾利用上述资料群,特别关注左倾在日台湾人的动态,分析过

-
- 4 何义麟《战后在日台湾人的处境与认同》,台北:五南出版,2015年、同《战后日本における台湾人华侨の苦悩——国籍問題とそ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変容を中心とし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No.679(2015年5月号)、同《战后在日台湾人之处境与认同——以蔡朝忻先生的经历为中心》、《台湾风物》第60卷第4期(2010年)。
 - 5 许琼丰《战后日本における华侨社会の再编过程に関する研究——在日台湾人と神戸华侨社会を中心に》2010年提交兵库县立大学博士论文(甲第101号)。
 - 6 杨子震《中国驻日代表团研究—初探战后中日·台日关系之二元架构》、《国史馆馆刊》第19期,2009年3月。
 - 7 大里浩秋、孙安石共编《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の现阶段》,东京:御茶の水书房,2002年、《留学生派遣から見た近代日中关系史》,东京:御茶の水书房,2009年和《近现代中国人日本留学生的诸相》,东京:御茶の水书房,2015年。川岛真《日本占领期华北における留日学生をめぐる动向》,前引《留学生派遣から見た近代日中关系史》、同《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选择——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刘杰·川岛真编《一九四五年的历史认识——〈终战〉日中对话の试み》,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所收)、王雪萍《救济——召还をめぐる国府の中国人留日学生政策の迷走》,前引《近现代中国人日本留学生的诸相》、同《中国の国费留学生派遣政策の変容と留学生の选择——国家の意思と留学生个人の意思との攻防》、《华侨华人研究》第10号,2013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の留学生·华侨回国促进政策——中国の対日·対米二国间交渉过程分析を通じて》、《中国21》33号,2010年等。
 - 8 王雪萍编著《战后日中关系と廖承志》,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0年。
 - 9 收录于战后神户华侨关系资料を読む会编《战后神户华侨史の研究》,神户: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2018年,第27-99页。

战后日本华侨社会重组的过程,指出了当时日本华侨社会固有的特征。(1)战后掌握侨刊,领导华侨舆论是台湾知识分子¹⁰。(2)率先表态支持共产党政府的华侨组织领袖大半也都是这些台湾知识分子¹¹。(3)这些台湾人的特殊背景可能追根于他们早在日治时期在台湾参加的农民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换句话说,战后的华侨运动与早期日本共产党的引导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受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在日台湾人、在日朝鲜人、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留学生这三者之间,曾存在过日共民族部互相连带的密切关系。而整个左派人士在1950年代的动向,都受了苏联共产主义阵营潮流大改变的影响¹²。大约在斯大林逝世后的1953-54年为界限,原来一国一党的原则被放弃和否定,确立了诸如在日朝鲜人、留日华侨与留学生等侨居国外的少数民族集团应该受祖国共产党或劳动党领导的方针。这是日本国内几个共产主义小集团和中国共产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隶属关系的开始。

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阵营在海外争取华侨社会领导权时,战况最激烈的地方就是华侨学校。因为华侨学校是最容易透过思想教育,给华侨学生灌输政府或政党方针的教育前线。战争结束不久的时候,日本各地存在规模大小不同的华侨学校14所,到了50年代中期,逐渐减少到7-8所。此后,群馬华侨学校和京都华侨学校不久即告停校,历史悠久的长崎时中学校由于华侨人口的减少,也最终在1988年停止教学。迄今作为全日制华侨学校在日本尚存的有东京中华学校、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10 陈来幸《在日台湾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脱日本化——战后神戸・大阪における华侨社会変容の诸契机》,贵志俊彦编著《近代アジアの自画像と他者》,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

11 陈来幸《战后日本における华侨社会の再建と构造变化》,小林道彦、中西宽编著《历史の桎梏を越えて》,东京:千仓书房,2010年。

12 陈来幸《在日台湾人と战后日本における华侨社会の左倾化现象》,陈来幸、北波道子、冈野翔太编著《交错する台湾认识——見え隠れする「国家」と「人びと」》,东京:勉诚出版,2016年。

横滨中华学院、大阪中华学校、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在台湾学界里,尤其东京和大阪的中华学校以及横滨中华学院(包括停办前的长崎时中小学),普遍被认为是台湾政府侨务委员会管辖下的“我方”华侨学校。

然而,1952年秋季开学之际发生的横滨学校事件,导致分裂独立出来而成立的横滨山手中华学校,以及1958年王昭德董事长因建校问题辞职,而重新成立学校法人理事会的神户中华同文学校,一向被归类为支持北京政府的华侨学校。1970年代(1989年重版)在台湾出版的《日本华侨概论》中,题名为“华侨教育”的章节里,对神户华侨社团运营的在日本规模最大的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却只字不提¹³。其实,前面所提到的“我方”三校,一直处于台湾政府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的管理系统之下,不少教员是由台湾派来的,教科书基本上也来自台湾,教学用的汉字均是繁体字。而神户与横滨山手两校,使用的是简体字,教员们不是校友就是从中国大陆请来,或是留日中国学生在当地被雇用的。从台湾政府侨务政策的立场来看,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是北京政府“方”的学校,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却在建校运动中实际上脱离了国民党和台湾政府的指导,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赤化关西的大本营”¹⁴。

我们知道,自从二战后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止的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并没有公开支持过北京政府,表面上基本是保持不偏不倚的政治中立态度¹⁵。比如说,每逢3月29日的黄花岗纪念日都有纪念品的颁发和来宾的讲话,国父诞辰和忌辰,都开展纪念活动。在左倾青年华侨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学校理事会的领导层反而被极左派的这些活动分

13 陈鹏仁《日本华侨概论》(再版本),台北:水牛出版社,1989年,第43-45页。

14 《据日本工作小组呈请采取积极政策争取神户同文学校一案拟具意见提请案会议记录(1958年1月18日拟稿)》,《争取神户侨校(1)》外交部旧档号065-00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编档案号11-EAP-02125),笔者参阅时无总页数。

15 中华民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编《日本国势现况暨在日华侨情形》,外交部档案11-EAP-02009《旅日华侨概况》,第27页。原文为“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表面上标榜中立,实际该校校长乃系受共匪控制”。

子攻击过。与其说是北京政府指导下的学校,不如说是当地侨领尽量维持政治中立的华侨学校。1961年时台湾政府还抱有怀疑地把它看作是“标榜中立”,实际受共产党“控制”的学校。然而,在1964年驻日大使馆制作的《旅日华侨概况》报告里进而标明,“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原系标榜中立,现已完全由该校校长倾匪份子李万之把持盘踞,实已沦为匪校”¹⁶。但同一部报告中的附表(二),把侨团分类为(1)忠贞侨团(共99)、(2)伪组织团体(包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共24)、(3)态度暧昧之侨团(共4),三种。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理事会和该校家长会却被列入“态度暧昧”的侨团之中。神户中华同文学校通过建校斗争,与最终未拨款资助建校的台湾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形容的复杂关系。

随着日本社会主流思潮的变化,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台日断交)后,同文学校的主脑才作了最后的判断,挂起了正式被日本政府承认的中国国旗,五星红旗。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忽略当地华侨当时的心情何在。选择站在国民党和台湾政府一边,尽力维持侨校的大阪、东京华侨,想必是否也有他们自己的战略才会依靠台湾政府呢?这是什么样的战略?站在各地华侨社会的立足点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景?换一种说法,华侨社会的自律机制究竟如何,这是本文希望解开剖析的课题。

前引许琼丰博士论文第6章中,除了初步整理战后驻日代表团时期“华侨教育基金”的成立与经营过程,也描述了盟军占领日本时期神户华侨以“自备外汇的香蕉不结汇进口”来弥补华侨学校经费不足等问题而努力过的轨迹,以及在1958年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校舍重建中,华侨社会决定性地背离国民党政府的过程。换言之,这也揭露了国民党和台湾政府对神户华侨社会失去控制力的经过¹⁷。笔者曾对横滨中华学校分裂

16 《旅日华侨概况[此报告造成时期估计是1964年4月以后]》第2页,前引《旅日华侨概况》。

17 请参阅公开刊登版,许琼丰《战后中华民国政府的华侨政策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の再建》,《华侨华人研究》第6号,2009年11月。

成两校的1952年八一事件和九一事件,以及东京中华学校1953年和1956年的改组过程,做过初步的整理,描述了关东地区华侨社会和华侨学校的实态¹⁸。并指出,从横滨中华学校的两次学校事件发生时日方警察的出动,并由向台湾政府提出事后报告等的做法可知,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确实有参与,此事件的过程显示出横滨学校事件所蕴含的国际性。我们可以认定,“中”日两国“同步反共的第一步是从1952年横滨学校事件开始”。美国大使馆也注意到横滨学校事件的重要性,向使馆要求提供情报,建议台湾政府坚持方针。日方关键人物岛田英二还具体建议从驻日大使馆的教育基金中暂时拨出1万美元,“以供应变之急需”¹⁹。由此,笔者指出,日、美、台在冷战结构之中,在仅仅一所华侨学校的争夺事件中,发生过此种充分的“国际合作”是值得注意的。此外,笔者在金门岛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关于大阪侨校香蕉款的问题做过一次口头发表²⁰。以上是目前为止关于战后日本侨校争夺战的主要研究成果。

下面,本文将其他几所华侨学校当时面临的问题,放在冷战中台湾政府侨务政策的框架下做综合性的分析。主要利用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收藏的外交部档案,《大阪侨校香蕉款》、《驻大阪总领事馆侨校案》、《大阪中华学校》、《大阪侨务》、《日本侨校》、《横滨侨校》、《争取神户侨校》、《东京中华学校》等档案和国史馆所开放的档案。

关于大阪中华学校和京都以及长崎的华侨学校,至今还没有专门的学术研究问世。因此,本文第一步根据以往的研究,从简单介绍1952年

18 陈来幸《1950年代冷战影响下的横滨中华学校与东京中华学校》,《戴国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年,第87-105页。

19 《岛田英二来函摘译(第2号)》,外交部档案11-EPA-02130《横滨侨校(1)》,第64页。

20 陈来幸《东亚冷战结构的深化与日本华侨社会》,江柏炜、王秋桂主编《历史岛屿的未来——2015年金门历史、文化与生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金门: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非卖品)。

8-9月横滨侨校分裂问题与东京中华学校1953、1956年两次的改组谈起,在第2节仔细深入大阪中华学校如何争取实现香蕉进口方式去补贴建校经费。在第3节,从政府补助金以及政府为了说服华侨侨领而采取的对策这两个角度做一下梳理。试图对东京中华、横滨山手、横滨中华、大阪中华、神户中华同文、京都中华以及长崎时中各校面对的问题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这样做才能清楚地看得出各地华侨社会领导层一方为了自身的生存而选择的路径和其在此过程中的想法究竟如何。

一、横滨中华学校的分裂与东京中华学校的改组

1. 横滨中华学校的分裂

1952年1月由于陈文澜校长到任半年后就辞职,陈继昌校长到横滨继任。然而,因受到教职员的反对,大约两个月陈继昌校长也就不得不去职。4月起,学校就没有人做校长了。5月以后,董事长也形同出缺,横滨中华学校陷于无法在7月举行毕业典礼的情况。于是在家长们的要求下,教务主任乌勒吉²¹老师代理校长处理校务。八一事件就在这时发生。

1952年8月1日早晨,横滨总领事馆任命王庆仁²²为新校长,十多名董事带着6名²³新任教员,连同2名日本人²⁴进入学校,宣布“接收”横滨中华学校。家长们听到消息,就前往聚集,保护学校。新任教员和董事们就这样与家长和旧教员、学生们展开对峙。他们就商量对策,

21 本名叫吾勒吉和希格,籍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1944年留日,盛冈农林专门学校毕业。1950年就任横滨中华学校教师,历任横滨华侨联谊会、横滨华侨总会(亲大陆系统)副会长等职(可儿弘明、斯波义信、游仲勋编《华侨·华人事典》,东京:弘文堂,2002年,第52-53页)。

22 籍贯黑龙江省,1939年来日,在新泻高田师范学校留学。1940年加入国民党,1950年受联合国总司令部(GHQ)的请求,由国防部派到日本,1952年受政府之命,就任横滨中华学校校长,直到1960年为止。此后,就任多数亲台系统华侨组织理事等职(同上《华侨·华人事典》第66页),据注24 岛田报告,王君原为内政部调查员。

联络警察,要求派员处理²⁵。下午5点,大约100名戴着头盔的日本警察蜂拥进入学校,命令旧教员离开。“台湾反对势力借用日本警察的武力占领了中华学校的校舍,并贴上封条,禁止教师、家长、学生出入”²⁶的事件就此发生。依照横滨总领事馆的分析,横滨中华学校确实成了“中共爪牙之阴谋对象”,且认为“有日韩籍共党分子在后支持”此次的活动²⁷。

9月1日是开学的第一天。大雨中,华侨总会讲堂聚集了600人,正在进行开学典礼时,发生了在横滨港停泊的台湾海军突然闯入的事件。各班导师带着学生走向校舍,进入被新的王校长等“占据”一个月的学校,想再开始上课。100多名手持棍棒的日本警察包围他们,双方发生打斗。最后,警察逮捕了首脑人物。教员和学生被赶出学校。此即“九一事件”。被赶出去的学生和家长们后来在乌勒吉校长的率领下,分散到市内14个地方,做为临时教室上课。

此后不久,1953年2月,横滨中华学校管理委员会与东京华侨总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等团体共同组织“新校舍建设委员会”,取得山手町43号的土地,该年9月1日,两层楼的木造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校舍落成。横滨的中华学校,就如此在冷战中直接受到政治性的影响而一分为二,直到今天。

6年内换了5次校长确实是异常状态。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

23 《呈报横滨侨校经过情形请鉴核由》,《横滨侨校(1)》第21-23页。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百年校志编纂委员会编《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百年校志:1898-2004》(横滨:横滨山手中华学园,2005年)中描述,进入的有2名便衣警察和20名新教员,但,其实是十多名校董、1名校长、6(乃至7)名新教员、2名日本人,以及数名职员。

24 《抄岛田英二来函摘译(第1号):横滨中华学校接收经过》,《横滨侨校(1)》第62页。岛田报告中指出,王庆仁君偕新任职员8名及英二等日籍友人2人进入学校宣布接收。

25 《横滨侨校报告书(董事长王嗣凤)》,同上,第150-155页。

26 前引《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百年校志:1898-2004》,第108页。

27 同注23,第23页。

三组在 1952 年 8 月 9 日接到来自日本的报告,立刻召集总统府、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侨务委员会等相关部会的代表,讨论横滨华侨学校的问题。主要内容:第一,大家确定了一个共识,则此次的横暴情形“不是横滨一校问题”,而是“各地侨校均可能发生”的严重问题。第二,要制止这种暴行,“应循外交途径要求日本政府切实援助”²⁸。

第三组主任郑彦棻在 8 月 25 日对外交部长叶公超表示,横滨华侨学校的经费“向属自筹,由董事捐助者颇多”,但因为在此“青黄不接之时,尤其与共党斗争时期”,有必要“在教育基金内先拨少数款,以济眉急”,要求外交部长“速电”驻日大使馆²⁹。

1952 年上半年,当时横滨中华学校有 815 名在籍学生,33 名教职员,每年需要的经费约 800 万日元,其中一半可由学生每月的学费因应。事件发生后,由于继续上学的学生减少到四分之一,11 月只剩下 200 多名,学校陷入困境,不足的部分就由政府以因应紧急情况的方式,从一直不曾动用的“教育基金”拨款填补。华侨教育基金是在 1949 年 7 月驻日代表团时代时,从赔偿物资的相关资金中挪出 5 万美元设立的。规定上须有各地华侨募到同额捐款时才能从基金挪用相当额度的限制,而且使用目的也要受限。不是用来充实校舍建筑或设施,就是供作优良教员的津贴。

接到党与政府的决策,也取得教育部的同意后,外交部就以 9 月 25 日的第 142 号电文,指示驻日大使馆从华侨教育基金拨款 1,500 美元给横滨中华学校填补经费,后来又同意再次拨款 1,500 美元。1953 年 1 月 13 日当时,基金余额已变为 47,000 美元³⁰。

8 月 1 日陪同去接收学校的两名日本人中,有一人是岛田英二,他

28 《横滨侨校问题谈话会会议记录》,《横滨侨校(1)》,第 17 页。

29 《关于拨款救济横滨侨校教职员事》,同上,第 36-37 页。

30 《为奉电拨付横滨侨校美金 1,500 元电请鉴核由》,同上,第 79-80 页、《关于侨教基金事电复各情尚请察酌核示由》,同上,第 223-224 页。

被视为台湾政府与日本政府携手建立反共合作体制的重要人物,不只是向台北的国民党政府递交详细报告的文件,也向台湾的政府首脑提出与根本方针有关的建言。在事件发生后的8月14日写下的第一次岛田书信中,他极力主张以日本当局“发动政治力量”建立的反共合作体制为盘石³¹,而在9月13日写下的第二次书信中,他表示已在横滨“可云已收预期之效果”,并提出见解说,“其次全国各地侨校依天时地利关系,当着手长崎及东京各校,时期以双十节后为佳”,至于“共党势力最盛,思想斗争亦当最烈”的大阪与神户,应该留到最后“着手为妥”。不仅如此,岛田还说,美国大使馆也注意到横滨中华学校事件,要求提供情报,并曾派美国大使馆员至学校视察。他又建议台湾政府“务须有坚定之方针方可不失体面”。具体上的善后措施,则是从驻日大使馆的教育基金中暂时拨出10,000美元,“以供应变之急需”³²。

总而言之,纵使违背基金运用的规定,台湾政府决定应该为紧急情况做准备,不只挪用了50,000美元的华侨教育基金来维持横滨中华学校的营运,此决策过程中也有日本与美国政府的积极建议与参与。

2. 东京中华学校的改组

(1) 1953年的改组³³

最早对东京中华学校进行“整顿”是在横滨学校事件发生一年后。事情从教导主任李敏德和3名教员被怀疑是中国共产党间谍开始,然后在6月中旬,董事长郑勇昌和常务董事被叫到大使馆与大使会谈,“为避免横滨侨校事件之重演”,当场决定撤换李主任,郑董事长在此阶段对该决定面露难色。后来眼看改组行动迟滞不前,董显光大使(在任期间1952-1956年)便以严厉的姿态提出三原则:(1)不得继续雇用5名亲共

31 《抄岛田英二来函摘译(第2号)》,同上,第62-63页。

32 同上,第64页。

33 《外交部收电机字第3252号》,同上,第251-253、261页。

教员；(2)必须自行设法补充教员和筹措经费；(3)不遵从指示者将撤销其护照或华侨登记证。东京中华学校校董会虽劝告被指名的5名教员悔改,但决定不遵从大使指示。除了其中1名之外,暂缓解除其他4名的雇佣。然而,大使对中华学校的作法大为愤怒,便于8月16日召开董事会。最后决定遵照大使指示的劝告,取消该5名教员的华侨登记证。对学校行政如此强硬的干涉举动,虽然令校友会等团体有所反弹,但最后还是让5名教员离职。政府阻止这些人继续受雇的目标顺利达成。大使馆与国民党分别介绍教员补缺,高维先校长也在同时负起责任提出辞呈,由郑董事长以代理校长的身分接受。

(2)1956年底的改组

横滨总领事馆做为侨务监督部门,对于“标榜中立,态度暧昧”的郑勇昌董事长以及“暗中附和”的下一任校长杨名时等一部分教员始终感到不满,觉得董事长“对自由中国毫不重视”,需要加以“整顿”。但因为正在要求中央将工作费用纳入预算,决定“静待时机”,大约3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梅兰芳来日本公演时,郑董事长送的礼物引起非议,就以此为借口,总领事馆动员“忠贞”的华侨领袖,劝郑董事长辞去宁波同乡会会长,接着经东京党部协商,又与大使一起施压,劝他辞去董事长职位,并决定在1956年暑假时改组董事会³⁴。后来,看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领事馆就开始分化郑董事长和其他董事,以动员董事夫人组织妇女归国(台)观光团等活动拉拢,做好万全的准备,终于得到28名董事中17名的支持,然后在年假中的12月28日召开董事会。

董事会开会当天,拥护郑董事长的一派坚持反对改选和董事长辞职,并要求领事馆大使馆人员退离会场,双方展开激烈舌战。但最后还

34 《密(滨发45字第3046号)》,外交部档案11-EAP-02124《东京中华学校(1956.9-1975.9)》,第17-19页。

是以投票表决,通过了郑董事长的不信任案。事前的准备工作有了成果,台湾政府这边投下的不信任票有17票,反对票是10票,董事长确定要换人。于是到了1957年1月,东京中华学校以“事前计画周密,处理慎重,临机应变”,成功地“出乎匪方意料之外”,次任董事长张和祥和校长臧广恩走马上任³⁵。

二,大阪中华学校香蕉款始末

大阪华侨原有1930年附设于北帮公所内的振华小学校,但因受战灾被焚毁。战后1946年3月起,华侨暂借位于近邻西区川口旧居留地的大阪市立本田小学的一隅成立关西中华国文学学校,同年9月在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神阪分处的指导下成立董事会,改称为大阪中华学校,1948年8月增设中学部³⁶。后来因战后重建经济急速发展,日本学童增加,市政府教育课几度要求大阪华侨归还本田小学,并愿拨地供华侨新建校舍。当时,大阪华侨总会和大阪中华学校校董会发起集结大阪华侨南华公会、大阪华侨梅田公会等人士,成立“大阪中华学校建设校舍筹备委员会”。建筑费预估美金20万元,侨界商议负责捐募半额。其余的半数,陈廷岳以大阪华侨总会会长以及大阪中华学校建设校舍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于1954年6月申请政府准予免结外汇购运香蕉2万笼等赴日销售,并拨其盈利为校舍建筑费³⁷。陈廷岳的呈文说,海外华侨已成为共产党“第二步之攫取对象”,他们“尤以攘夺侨校,诱骗青年学子,为其处心积虑之企图”,最近共产党政府“拨汇美金十万元到日,专为

35 《密(滨发46字第0071号)》,同上,第44-52页。

36 许淑真《大阪の华侨》,神戸华侨华人研究会编《神戸と华侨——この150年の歩み》,神戸:神戸新闻综合出版センター,2004年,第187-188页。

37 《据旅日侨领陈廷岳呈为筹建大阪中华学校新校舍事准免结汇购销香蕉等货输日以盈利援助建筑费等情抄同原呈函请查照核办由(1954.7.6)》,外交部档案11-EAP-02121《日本侨校(1)》,第109-112页。“拨汇美金十万元到日”指的可能是北京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给东京同学总会拨汇的救济金,当时大约的总额。关于这一点,第四节有相关的说明。

攘夺侨校之费用”。又说,左派向侨界大肆煽动,扬言“我政府绝不能帮助建设”,又有“若拥护他们,马上就有资金可兴工”等语。

通过将近两年与日方有关方面交涉的结果,1956年12月,日本通商产业省终于同意特别发给大阪侨团香蕉输入许可证。香蕉在日本是属于管制进口品类。每年限有一定的金额,非经特别许可者,不得额外进口。日方鉴于此项申请的公益目的,要求缴纳每一篓2,432日元的差益金³⁸。日本方面的许可证拿到后,侨校免结汇输日二万笼香蕉计划为了获取成功,最后的难关在于突破并通过台湾政府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的审查。这时候台湾方面管理外汇极为严格,政府原则上不能损失过多的外汇,因此进行贸易需要外贸会的审查。当时台湾香蕉在日本很受欢迎,一篓底价值2,700日元的香蕉,可卖到6,000至7,000日元,因此,从政府的立场来说,允许某一民间团体额外输出香蕉,等于是官方对他们的捐赠。外贸会对此案犹豫不决。

但是,因为这是驻日大使和日本通产大臣之间特别的约定,大使馆也担心如果此事不达成的话,会影响“本馆的信誉”,就特别打电给外交部和侨委会,强调这是“免结汇出口”特案,请求协助此案的实施。这样,以“本案情形特殊,自应设法协助”的说法,催促外贸会答应台日贸易协定额外的免结汇香蕉输日。1957年4月16日,大阪中华学校建校委员会委员长王汝钧、大阪中华学校董事长(大阪华侨总会副会长)孙永和、董事王寿光、董事陈德湖、董事童仁明、顾问陈毅6人组成“大阪华侨文教致敬团”一起访台,与当时在台的大阪华侨总会会长陈廷岳一起在台努力酿造支持侨校的气氛。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香蕉输日终于得以实现。从1957年5月27日

38 《关于大阪侨校请输日香蕉二万篓以盈余充建校舍一案谨将经过情形报呈鉴核由(1956.12.8)》,外交部档案11-EPA-02120《大阪侨校香蕉款》,第5-9页。一般香蕉进口须缴纳一篓2,862日元的差益金,日方鉴于公益项目,提供15%的优惠,商定差益金为2,432日元。

使馆第一次收蕉款,到最后的7月底为止,香蕉连续到达日本,前后共进口16,629篓。陈廷岳会长自台湾返回大阪后的9月间,在大阪华侨总会对整个香蕉输日过程和资金的流向做了第一次报告。香蕉原价共3千8百多万,销售6千2百多万,经费1千8百多万、其中陈会长旅费和交际费用开支4百余万,经办华侨青果业者佣金交通费等5百多万,净盈余500万多日元。建校委员会委员长王汝钧等侨领对会长此次报告,“颇有微言”。王汝钧等其他侨领的访台费用均为自费,但会长返台各项费用所费达数百多万元竟由公费支出,是侨领们不满的原因之一。另外,对于经办人佣金过多的浪费也是不满的主因。除此之外,使馆对此次侨团建校委员会奉命“监督”,在政府对侨领们不信任的态度本就引发着侨领们不满的情况下,香蕉款资金的流向被如此揭发后,更让人气愤填膺。最后王汝钧说出“净利只剩500万,不如不要。学校是我们的,不属国民政府,以后我们继续中立,谁也别来管”等语。其实,建校运动开始时,王汝钧自捐巨款,并奔走募捐出钱出力,颇有功绩。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查和调整,最后确定下来的收支明细表(表1)所显示,香蕉原价38,233,914日元,扣除差益金、关税等的总销售额为62,236,097日元。预计的盈利应该是2千400多万。但是,之间支付的日本方面政治献金850万,交际费100万,支给会长的在日在台费用386万,交通费、保证费共60万,佣金(原来以1篓300元,后来改为以250元计算)总共4,157,250日元。结果,可用在大阪侨校建筑金,存储于大阪中国银行的仅剩5,885,033日元而已。

总而言之,侨社对此次香蕉问题确实有“徒劳之感”。官方的说法是,政府实属好意资助学校,结果侨领须转托内行代办,结果“事倍功半”,大部分耗于中间费用³⁹。两年前使馆原本预计2万篓可收利益4,800万日元,结果相差甚大。

39 《关于大阪侨校输入香蕉案内情事》,同上,第88-91页。

表 1 大阪侨校香蕉款收支明细表

摘 要	收入(日元)	支出(日元)
销售香蕉总收入	62,236,197.00	
拟在东京中国银行开户数		38,233,914.00
支大阪侨校建校款		5,885,033.00
支政治现金(S经手)		8,500,000.00
支交际费 年礼(N经手)		1,000,000.00
支东京 大阪费用		400,000.00
支陈廷岳在台费用(礼费 邮电费)		1,800,000.00
支陈廷岳在日费用		2,060,000.00
支佣金		4,157,250.00
支利息保证金		200,000.00
合 计	62,236,197.00	62,236,197.00

注：日方之差益金等项于征款时即已扣除，故不包括在内。

资料来源：《原收支明细表》，外交部档案 11-EPA-02120《大阪侨校香蕉款》，第 128 页。

1958 年 4 月使馆给外交部的密电说明了此次大阪华侨总会输日台蕉以利润充建校补助费一案问题的所在⁴⁰。此案(1)从“政府爱护侨校之至意”出发，(2)“力求符合国内外外汇贸易管理规章”，(3)同时要“尽力解决侨民的困难”。这三项目“又常相左，若干周折，时有难于尽言者”。并且没想到日方每月运量的限制，通产省管得格外严格。日方发许可证的时候，和使馆侨社方原商定 5、6 月各进口 7000 篓，7 月 6000 篓，共 2 万篓。但是由于侨商求免结汇，外贸会初不允，因此开始的时候香蕉迟迟未运。到了 5 月底也才仅能进口 3,629 篓而已。当时在日本，关于外汇违法案件屡有发生，因此侨民原允 T/T 方式的也不敢照办。并且，在日本法律之下，东京中国银行不得以自由美金购本案日币。因此，用销售前面一批香蕉的盈利再去收购下批的香蕉这个办法，在实际运作上遭遇到困难。使馆和外贸会会商(6 月 7 日)后，决定为了建立侨

40 《驻日使馆致外交部密电(1958 年 4 月 2 日)》，同上，第 116-127 页。

校争取侨民,采取以侨商缴存日币,代替 T/T 的办法。这样,使馆在东京中国银行代台湾银行开设账户,等将来有办法时再汇回,以便侨商经办人陆续缴款。正如当时官方留下的档案中所说,其实本案向日方说明是政府“免汇捐赠”香蕉给侨校,所以关于本案实情的电讯必须是“有机密性”的⁴¹。

最后政府也似乎不得不以决定按照日方的制约,不仅把盈利部分,连香蕉底款也包括在内,将扣掉经费的销售所得的全额作为维持侨校的基金来处理此案。这就是所谓的“大阪侨校蕉款余额(香蕉底价款)”的成立。“大阪中华学校建筑基金”5,885,033 日元存放在大阪中国银行,由大阪侨校来启用。通过与大藏省的交涉,另一方“大阪侨校蕉款余额”38,233,914 日元,使馆代台湾银行存放在东京中国银行“非居住者”日元账户⁴²。日方对其用途加以限制,限定用途是为在日华侨学校之建筑及教育设施费用资金,提款时须先经大藏大臣核准。

当时政府对神户侨校和神户侨民的争夺也非常关心。此款原来是中央(第三组和侨委会 1958 年 7 月 10 日电⁴³)决定“圈存备用于神户同文学校建校经费”的,但后来因东京侨校建校费需款甚亟⁴⁴,欠建筑公司中野组款,1959 年 2 月底到期 891 万,6 月底到期 1000 万。使馆提议以一时垫款的方式挪用此款⁴⁵。幸亏动用了大阪香蕉底款,东京中华学校的扩建才得以告一段落。扩建二楼部分和礼堂竣工。大阪中华学校的建校,是依靠盈利部分的大阪中华学校建筑基金以及大陆灾胞救济总会 3000 美元⁴⁶(折合 108 万日元)两种特别补助金顺利完成的,于 1958 年

41 《驻日使馆致外交部密电(1957 年 6 月 28 日)》,同上,第 57-58 页。

42 《驻日大使馆致财政部电(日使(48)经字第 6439 号,1959 年 12 月 7 日)》,同上,第 170-172 页。

43 丘念台《调查报告(1959 年 4 月 6 日)》第 2 页,外交部旧档 065-0012(新编档案号 11-EAP-02127)《争取神户侨校(3)》。

44 《为东京中华学校请节点建筑费事电请惠办见复由》,《东京中华学校》,第 196-199 页。

45 《外交部电》,《大阪侨校香蕉款》,第 168-169 页。

6月竣工,迁到浪速区敷津东现址的新校舍。

几年后驻日大使馆在1964年编的《旅日华侨概况》中说明,由于各地侨校发起筹募基金运动,“经我驻在地使领馆之辅导与协助颇有成果,现东京与大阪两地侨校,已能以基金运营所得充裕经费”⁴⁷。

以输日香蕉协助侨校的办法,曾在1952年以前驻日代表团的时候试办过。但是,日本独立政府启动以后,有一段时期日方对于香蕉慈善目的的免结汇进口一概不予许可。横滨侨校虽1953年间得到过侨商转让香蕉出口权给侨校的受赠,这是例外。1956年大阪侨校香蕉款案经过华侨和使领馆的努力,终于取得日本政府的进口证明书,对侨社来说是一大转折点。同一时期,为了筹建东京中华学校高中部校舍及礼堂和增建横滨中华中学校校舍与补助经常费,两校也向政府共同请求特准输日香蕉35,000篓(美金7万5千)。东京中华学校董事会1956年12月被改造,成为“完全忠贞”的侨校。1957年1月刚上任的新董事长张和祥、校长臧广恩等“深知祖国为反共复国需要外汇殷急,不愿有损国力”,因此恳求政府“以名义上赠送侨校,其应收之外汇货款,可由侨团以捐款方式经我大使馆汇回祖国”⁴⁸。横滨中华中学也为了修建校舍,还单独请求政府特准自备外汇(美金4万元)输出2万箱苹果⁴⁹。1957年10月,苹果销售后所得1,160万日元存入中国银行,成立横滨侨校苹果款基金(第3节表3)⁵⁰。

46 《为呈报领到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补助本校金参任元事》,外交部档案11-EAP-02122《日本侨校(2)》,第39页。

47 《旅日华侨概况》第2页,《旅日华侨概况》。

48 《为筹建东京中华学校高中部校舍及礼堂,及增建横滨中华中学校校舍与经常费等,拟请政府特准香蕉3万5千萝输日,以资补助由》,《日本侨校(2)》,第43-44页。

49 《日本华侨学校经费问题座谈会纪录》同上,第50-51页。

50 《横滨侨校苹果款存取清单》同上,第221-223页。

三, 1950年代国府对华侨学校拨发的补助金

1949年7月, 驻日代表团从日本赔偿物资中拨发5万美金(折合1,800万日元)作为基金, 以振兴华侨教育为目的成立了华侨教育基金临时委员会, 向各方面展开募捐活动, 使侨教基金更加充实了。1950年8月临时委员会再经改组, 成立“华侨教育基金委员会”。1950年8月到1952年5月之间, 侨教基金会为了处理华侨教育的问题, 一共召开了14次会议, 主要讨论的是华侨自备外汇输日香蕉事宜。早期, 政府对各个侨校的经费补助, 是来自日方等各种募捐, 加上自备外汇输日香蕉获得的盈利来充当的。据许琼丰的研究, 1951年8月起到11月为止,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香蕉运营委员会共进口3,608笼香蕉, 扣掉手续费后的销售总额为12,136,659.5日元⁵¹。以神户华侨总会会长王昭德和神户华侨福利合作社代表陈义方两人为名义代表人(捐赠人), 实行了独立方式的自备外汇香蕉输日, 除神户外其他8校实行的是政府使馆领导下的共同方式。其实, 侨教基金5万美金在驻日大使馆的管辖之下, 直到1952年10月为止, 一直未被动用。

下面, 通过分析这项侨教基金的流向(表2)和官员留下的档案, 以及当地华侨普遍阅读的报刊文章等, 了解一下除了大阪侨校以外当时侨校的总体情况。

51 前引许琼丰《战后中华民国政府の华侨政策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の再建》, 第69页。

表2 华侨教育基金户收支报告表(美金:折合日币 360元)

期 间	1952.10-1953.12	1954.1-1954.6	1954.7-1955.6	1955.7-1956.6	1956.7-1957.6	合 计
前期余额	50,000.00	39,299.99	36,383.31	27,803.26	6,502.47	4,935.81
本期支出	10,700.01	2,916.68	9,983.83	21,894.47	1,566.66	
本期收入			1,403.78¶	593.68		
横滨中华学校	4,550.00	394.45				
校舍修缮补助费等	1,500.00*	555.55				7,000.00
东京中华学校	2,500.01‡	1,666.68	3,333.36	3,333.36		
校舍修缮补助费等			2,000.00‡		366.66†	13,200.07
大阪中华学校			600.00	1,200.00		1,800.00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600.00		600.00
校舍修缮补助费等				2,000.00‡		(2,000.00)
长崎时中学校	150.00	300.00	1,050.00	1,200.00		
校舍修缮补助费等	2,000.00					4,700.00
留日学生补助费	-	-	2,400.47	4,518.39		6,918.86
其他办事费用等			600.00	9,042.72§	1,200.00	10,842.72

¶ 与留学生补助金账户合并

* 救济横滨中华学校忠贞教职员。

‡ 1953年9月开始每月277.78美元的补助金。另外有一条1,388.89美元捐助东京中华学校经费,合计2500.01美金。两年后,在第一次校舍扩建时动用了两千美金。

† 改组经费困难,发给特别补助费(1月-3月每月44,000日元)。

‡ 一次性补助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建筑费。

§ 包括董大使显光编写的日文版《蒋总统传》一千部价款日币71万元(美金1,972.22)。

资料来源:根据《华侨教育基金户收支报告表》外交部档案11-EAP-02121《日本侨校(1)》,第27-33页,11-EAP-02122《日本侨校(2)》,第204-220页,笔者制成。

1. 京都

原来在京都的光华小学校成立于1928年,其实它比华侨人口更集中的大阪振华小学校早3年成立⁵²。二战中虽被停课,但在战后受留学

52 陈正雄《京都华侨》前引《神戸と华侨——この150年の歩み》,第209-210页、第216页。1928年在京都市中京区聚乐回西町163番地成立京都华侨光华小学校。成立早于大阪振华小学校。战后京都中华学校的老师大都是光华寮、吉田寮、卿云寮的留学生。此外,当时在京都的留日学生也给其他地区的华侨学校提供了不少老师,这是京都华侨对日本华侨社会作出的较大贡献。

生居多的地方性影响,京都中华学校很快在侨民和留学生的支持下成立了。据说在1947-48年的时候学生超过一百名,并具备走读用的专车。可是在战后华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不得已退学的学生增多,学生人数大大减少。大阪领事馆与京都华侨总会正副两会长商量后,在1954年4月呈送东京使馆的报告里说,该校所使用房屋积欠租金甚鉅,侨会无力负担,将于年底期满届时拟将房屋退租,“使匪帮无活动根据地”。当时,京都中华学校被认为董事会为“留学生同学会所把持,难以改组”,“好在该校仅有学生十参名,暂时停顿影响不大”⁵³。这个时候政府方面竟有另外设一华侨学校的构想。然而,从侨民的立场来看,领事馆对京都侨民民族教育的做法是“弃而不顾”的做法⁵⁴。其实,在1959年左右作成的“日本侨校请补助案资料”特设京都华侨小学一栏,说明现在“当地侨胞请求重建我方侨校一所,需建筑费600万日元,政府补助一半,地方自筹一半”,所需建筑费数额栏为300万元数字⁵⁵。

2. 长崎

长崎时中学校的校舍是借用孔庙,“日久未修,虽经政府补助修缮费2,700万元,仍无济于事。现拟全部修建,需费1,600万日元”⁵⁶。表2显示,政府给长崎时中学校每月50美金的补助1953年10月开始,1954年10月增加为每月100美元。包括建校建筑设备费的补助,政府给长崎侨校从基金共拨了4,700美元。

53 《关于整顿京都中华学校事》,《日本侨校(1)》,第99页、第102页。1948年时,董长为林炳松、校长徐廷烈(李文煦《论日本华侨教育界》,《华文国际》第2卷第4-5期合刊,1948年7月,第19页)。依资料可查,1954年时董事长林斯土、校长是聂毓良。

54 《みすてられた京都中华学校:もうからんものに金を出さない领事馆》,《侨民报》第1号,1953年4月25日,第2页。

55 《日本侨校请补助案资料》,《日本侨校(2)》,第177页。

56 同上,第176页。

3. 横滨

横滨学校事件是北京政府成立大约3年后的1952年8-9月发生的,因被定位为国共争夺侨校的前哨战而具有重要性。位于中华街的横滨中华学校分裂后,反抗国府的横滨侨民在山手地区另建校舍,成立横滨山手中华学校⁵⁷。学校分裂之前,横滨中华学校本来学生数约为815名,事件后,1953年初减为209名⁵⁸。因此,学校无法维持,从1952年10月开始不得不动用5万美金的基金。这种动用虽然“在原则上与补助规定不合”,大使馆以提取美金1,500元拨助忠贞教职员的要求,得到政府的允许⁵⁹。可见,基金开始动用的契机是为了维持“情形复杂经费困难确属实情”的“我方”横滨学校。包括学校的修缮补助费用,大使馆从侨教基金一共给横滨侨校拨出了7,000美元。1953年4月底,政府还专门为了补助横滨侨校,特准横滨侨校免结汇输日香蕉五千篓⁶⁰,由侨商转让优先出口证给侨校,才算解决了学校的财政问题。出口香蕉获利250万日元,每月生利息约8万日元(200美金),相当于之前为止使馆提供的每月补助金的金额⁶¹。虽表2所示横滨中华学校1954年7月以后没有数字,但政府是另外以协助侨商转让香蕉出口权的方式支持了侨校的经营。

前引《日本侨校请补助案资料》横滨中华学校一栏说明,自1952年10月起,政府援助该校“数达美金21,000余元,另准香蕉输日苹果进口获利日币1,410万元”。1956起按月补助美金200元。这里指的香蕉输日苹果进口是1957年着手试办的另一种。下面再加以分析。

57 前引《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百年校志:1898~2004》以及横滨中华学院编辑的《横滨中华学院百周年庆纪念特刊》(2000年)可供参考。

58 《横滨侨校报告书(董事长王嗣凤)》,《横滨侨校(1)》,第157页。

59 《为奉电拨付横滨侨校美金一千五百元电覆鉴核由》,同上,第79-80页。

60 《为横滨中华学校输日香蕉五千篓案函达查照由》,同上,第208-210页。

61 《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馆代电滨发(42)字第2248号》同上,第257页。

4. 东京

下一步台湾政府争夺侨校的策略将重点放在改组东京中华学校董事会和协助该校的扩建。东京中华学校在战后暂时借用中央区日方的昭和小学校。1948年在现校址千代田区五番町14购地,1951年成立财团法人进行注册和自办校舍的建设。这时候,驻日代表团补助的金额是日币150万⁶²。

表2显示,从1952年年底开始,到最后1957年的6月为止,政府总共补助了13,200多美元。东京中华学校是侨校中从侨教基金直接拨款最多的学校。其理由之一是该校经过1953年和56年的两次校董会的改组,已成为“完全忠贞之侨校”。而且每月277.78美元的补助是第一次改组刚实现后的1957年9月开始,而以后,一直是没有变化的。再说,张和祥新理事长上任不久,就向当地华侨募款1,800万日元,着手第一期的校舍扩建工程,于1957年7月竣工,新盖了八间教室。接着要开始第二期工程,大约需要3,900万日元。政府决定先代垫2,000万日元。对于这笔代垫款,想出的办法是政府先给东京中华学校6万美金的苹果优先进口权,再由获得的利润还款给政府⁶³。依照东京中华学校在1957年12月4日向外交部提出的资料“苹果出口计画”,可知他们是基于以下的判断:以横滨中华学校的经验来说,每3万美元该可望获得1,100万日元的利润,但如果一次出口大量的苹果,就有可能在台湾当地造成跌价,因此为了确保2,000万日元的利润,一方面要请政府停发其他的进口许可,一方面也要有效利用市场价格,要求政府放宽进口许可期间的限制和允许分期进口⁶⁴。

62 东京中华学校网页(校史/沿革) <http://tcs.or.jp/about/school-history/> (2019年10月31日确认)。

63 《关于东京中华学校请准由日运苹果至台以其盈余归还中国银行东京分行垫借该校建筑费事,电请查照核办见复由》,《东京中华学校》,第118-120页。

64 《东京中华学校(呈):附呈(一)苹果进口计画(二)本校第二期建筑工程估价单》,同上,第121-124页。

前引《日本侨校请补助案资料》东京中华学校一栏说明,东京中华学校历年政府补助该校修建及设备费“计日币 150 万元,另美金 2,500 元”。该校第二次扩建建筑费需日币 3,891 万元,“均由财政部核准在大阪蕉款内先行垫款”,并且使馆转送该校“输入物资贸易计划俾获利归垫案正研议中”。1954 年起按月补助该校美金 277.78 元。

5. 神户

在前任吴玉臣董事长辞职,1955 年王昭德董事长上任的时候,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请求政府拨出经常费的补助和建校补助金。据侨教基金收支表(表 2)可知,1956 年时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确实领过半年时间一个月 100 美金的补助金,政府还拨了 2,000 美元的校舍建筑费。加上大陆灾胞救济总会对神户侨校的重建资助的 3000 美元⁶⁵,这两项共 5000 美元(180 万日元)的建筑补助金,暂且存放在神户华侨信用金库,最终没用到。这是因为神户侨校一直被怀疑有左翼倾向,政府是在开除李万之校长和李荫轩教务主任的条件下才同意拨发补助金的。另外,如上所析,政府还准备了东京中国银行圈存给神户侨校建校用的香蕉底款,但这项底款最终也被暂时挪用,用于给 1958 年 7 月完成工程的东京中华学校的建筑费垫款。

最关键的是,以革除校长和教务主任为内容的改组计划在 1958 年 5 月 15 日的校董会被揭露后,遭到董事会、家长会、校友会的反对,终于告终。当年 11 月 17 日董事长王昭德提出辞呈,12 月 13 日,校长辞职劝告决议案竟然被校董会否决了⁶⁶。在得不到政府补助金的情况下,神户侨社为了建校募款大大开展节约储蓄运动,终于凑到两千多万日币的

65 《为呈报有关侨务委员会及大陆救灾总会拨款补助侨校情形由》前引《日本侨校(2)》,第 267 页。准侨务委员会 1956 年 8 月 4 日侨(45)教 42132 代电以暂不动用

66 关于争取同文学校的细节,参考了前引丘念台《调查报告(1959 年 4 月 6 日)》,第 1-5 页,《争取神户侨校(3)》。

建筑募金,也得到了神户日方银行的支持。翌年1959年9月,新校舍竣工⁶⁷。在原来中华会馆的地皮上新建的神户中华同文学校,依据当地日本的法律,注册为学校法人。未经台湾政府认可的全新的理事会1958年8月成立,陈德仁就任理事长。台湾政府对神户华侨学校的介入政策,就这样遭到侨民的抵抗,被谢绝而告终。

政府给神户侨校到底提供了多少补助金,实在很难估计。我们仅能从大使馆在1959年左右制成的前引《日本侨校请补助案资料》里对每所侨校做的如下总结中,窥见其大略⁶⁸。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校舍向日方借用,因日方索回,拟自建新校舍需3,000万日元。因该校校长“亲匪”,“侨社无法控制”,我方势须另建新校。表2 1955年度的1956年1月起每月补助该校经费100美元,“至1957年7月停顿”。

回头看看表2,可见1954年7月以后,教育基金和留学生基金合并后,基金马上告罄。如1955年度,9,000元以上被用在办事费,连董大使编的日文版《蒋总统传》的印刷费都从教育基金拨出。1956年度,仅东京中华学校,因改组经费困难,发给特别补助费(1月-3月每月44,000日元)336.66美金。接来表3显示的是1958年之后两年的《华侨学校补助金收支表》。

非常明显,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已经不是补助的对象了。那么,1956年7月以后到1958年6月为止的情况如何?笔者尚未发现政府对日本各地侨校拨发补助金的完整的收支表。但,在个别侨校的档案中能够发现其线索。横滨侨校苹果基金收支明细表中却有政府对横滨侨校的补助费(1957年10月到1958年9月)⁶⁹。因此可以推测,其他学校的补助费总算也是有可靠的财源来支出的。因此,神户中华同文学校也有可能

67 李万之《我和神户中华同文学校》,陈德仁编《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八十周年纪念刊》神户:学校法人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理事会,1984年,第296页。

68 《日本侨校请补助案资料》,《日本侨校(2)》,第176-177页。

69 《横滨侨校苹果款存取清单》同上,第221-223页。

表3 华侨学校补助金收支表 1958.7-1959.6 (/-1960.6)

收入	本期收入	
6,117.73	侨务委员会易货美金侨校补助金	¥2,203,102
1,995.55	侨务委员会易货美金侨校补助金	¥718,400
180.08	本馆补助汇兑差额	¥6,508
8,133.36		

本期支出		支出
东京中华学校补助金	\$277.28	3,333.36
横滨中华学校补助金	\$200	2,400.00
大阪中华学校补助金	\$100	1,200.00
长崎中华学校补助金	\$100	1,200.00

资料来源：根据《横滨侨校苹果款存取清单》外交部档案 11-EAP-02122《日本侨校(2)》，第 299、303、307 页，笔者作成。

确实从 1956 年 1 月到 1957 年 6 月收到了一年半的补助费。

如上所述，台湾政府在国共争夺侨社激烈的时候，为了从侨校排除共产主义份子，处心积虑地改造了横滨、东京、大阪等地侨校的校董会，并确立了董事长监督校长的侨校制度。补助侨校是政府争取侨民的很好的资源筹码。补助的方式反映了政府的先后顺序。换言之，各地的侨社侨领利用政府急躁的心情，成功地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补助，完善扩充了自己的学校。在政府有限的财政条件中，争取顺序排到最后的神户侨民，只能以自力更生的办法加上日方银行贷款等的支持，实现了学校的重建。应该说，神户侨校并没有依靠北京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援助。

四，1950 年代北京政府对留日华侨与留学生的政策和台湾政府的对策

关于北京政府方面如何对执行争取侨民侨校政策的问题，目前研究成果并不多。有关政策之一是北京政府为了弥补高级人才而实行的海外人员归国促进政策。这些政策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直属“办理留学生事务委员会”以及 1949 年 12 月成立的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侨

委)”来承担。后者主任为何香凝,副主任为其子廖承志。1952年受周恩来总理之命,廖承志主管对日业务的体制确立之后,留学生和华侨的事务改为统一管理。1952年9月到1957年9月,北京政府通过东京留日同学总会给400多名留学生分发了救济金。救济金的大量分送改善了办理留学生事务委员会仅补助一部分归国旅费的情况。这些救济金也用在同学总会的运营,加强了华侨留学生和北京政府之间的联系⁷⁰。1956年以后,留学生的调查等本来是教育部该管的事务也直接通过东京华侨总会,即侨委系统的渠道来传达指令。1952年秋东京留日同学会发出以中日两文介绍北京侨委来电的通知如下:

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主席:

据归国留日华侨同学说:现留日华侨同学,生活极其困难。贫病交集,有碍学业,为此特先汇去美币9,881元4角2分,希你们收此款项立即救济他们,只要确系贫苦,皆应救济,救济办法与今后每日需款若干请告知。

北京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⁷¹

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通过东京同学总会分发救济金是从1952年11月开始,此后,在当年年末为止,继续汇出22,000美金(11月),21,000美金(12月)。王雪萍指出,1953年之后几千名留学生和台湾人坐船赴大陆的原因,可追溯其理由于这时候北京政府无条件分发的宽容的救济金⁷²。这种留学生救济金无疑刺激了台湾政府的有关部门。台湾政府

70 王雪萍《中国の対日政策における留日学生・华侨——人才確保・対日宣伝・対中支援》,王雪萍编《战后日中关系と廖承志》,第108-110页。

71 东京留日同学会《通知》,《横滨侨校(1)》,第66页。

72 王雪萍《战后期日本中国人留学生生活难政治姿勢葛藤》,大里浩秋编《战后日本与中国・朝鲜——プランク文库を一つの手がかりとして》,第99-110页。

通过留日代表团对留日学生补助金的分发从1949年11月开始,1952年9月告终。自驻日大使馆成立,且留日同学总会明显表明了倾北京的态度以后,台湾政府重新组织直属的中华民国留日东京同学会,逐渐增加收容了来自台湾的留学生。虽在外汇困难,留学生业务更加复杂的条件下,台湾政府方面也专门开设留学生补助金户开始资助留学生,维持了两年⁷³。按1954年的登记,留学生总数为425人,而散布在98学校。1955年1月,大使馆电请教育部按月拨汇补助金或动用侨教基金⁷⁴。表2“华侨教育基金户收支报告表”中的“1954.7-1955.6”年度,有总额1,403.78美元的“本期收入”。这就是使馆留日学生补助金户转账过来的款项。从此以后,侨教基金户和留学生补助金户合并为一,导致侨教基金即告用罄。补助金和救济金的分发是国共两方争夺留学生与华侨的另一侧面。

廖承志掌权后,继承救济金的拨发,第二项着手的主要工作是跟日本政府交涉迁送留在中国大陆的残留日本人回国和迁回留日学生华侨归国的实现。1953年6月27日,551名乘坐的第一批兴安丸开出京都舞鹤港以后,到最后一次的集团归国船1958年6月29日开出为止,将近4,000名留日学生和华侨分14批实现回国,其大多数是台籍侨民。每次乘船都有乘船代表。其实,日本国内亲北京政府的华侨团体的主要人物与中国共产党以及北京政府的直接接触是趁此机会,作为乘船代表到北京才得以实现的。不少留学生和华侨在这时候直接被受命在日本展开了此后的华侨运动。比如,原来属于日共民族部的地下党员韩庆愈后来主编《大地报》(1954年3月创刊)就是受命于廖承志⁷⁵。正值斯大林的去逝使得苏联共产党的方针大幅度改变,居住国外的外籍共产党员

73 《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留日学生补助金户收支报告表》,《日本侨校(1)》,第27-33页。

74 《电请贵部按月拨汇补助金款项或准在侨教基金动用由》,同上,第133页。

75 前引大类善启《ある华侨の战后日中关系史——日中交流のはざまに生きた韩庆愈》,第98-110页。

也变得需要听从祖国共产党的命令了。

1954年1月留日华侨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以后,各地纷纷出现和北京政府有具体联系的华侨团体。1957年2月,神户以陈义方为会长,成立了神户华侨联谊会。是支持北京政府的现神户华侨总会的前身。副会长林水永、蔡送来、蔡振耀、陈恒华。监查委员林清木、陈通、庄得渊、事务局长曾广仁、总务局长陈德胜、副总务局长陈学忠。办事处在华侨信用金库的3楼,华侨文化协会之内⁷⁶,是以台湾人为主,继承留日华侨民主促进会(1948年10月成立)的亲北京政府的组织。

北京中央出现了以廖承志为主的“知日派”队伍,推行留日华侨和学生的政策的同时,自1953年至1956年,全国推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的合作社化也同时进行。时局极为动荡。1954-55年间,面对全国民众的所谓“解放台湾的政治宣传工作”一向“抓得不够紧”。比如,在上海,民主建国会在市政协的指导和帮助下,积极开展工作是在1958年9月以后的事⁷⁷。具体开展的形式有,(1)以召开座谈会、茶话会、联欢会的方法广泛开展宣传教育,(2)组织有关成员对台广播、写家信、及时地对有重点地组织成员撰写海外报道专稿,进行对台工作,(3)组织参观对台宣传工作展览会,(4)通过正副主任赴香港参加庆祝香港中华总商会成立60周年纪念在港期间,广泛接触香港工商界人士,对港澳进行宣传工作⁷⁸。众所周知,58-60年是大跃进政策失败加上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的时期。社会十分混乱,导致了全国教育经费的缩减。1957年10月给留日华侨学生的救济金的拨发终于宣告停止。政府实在是没有

76 《(大阪领事陈衡力致外交部电)关于神户附匪份子组织华侨联谊会事(1957年3月2日)》、《神户伪华侨联谊会会章》外交部档案11-EPA-01992《大阪侨务(1956.9-1957.12)》,第76-82页。

77 民建上海市委员会对台工作组《关于对台宣传工作小结》,上海档案馆所藏C48-2-2478,第1页。

78 两会台对台工作委员会《民建,工商联两年来对台工作总结》,同上,第5-9页。

力量资助海外侨团了。

因此,台湾政府这时候对北京政府的警戒应该说是太敏感了。其实,没有中共的策动,留日华侨也是倾左的。正如丘念台给蒋总统呈报在日台侨倾共原因时说明的那样,“在日华侨四万余,台籍约三万,大陆籍侨民十之七八反共而台籍侨民则同情共匪者反有十之六七”,民国42年“华侨回大陆时,大陆籍回者仅四百余,而台籍回者反在二千以上”,“日本战败受美管制,因民族自尊心强,人民多数变成反美左倾,亲匪轻华。故台侨亦受影响,是以台侨之倾共情,实可悯”⁷⁹。

结 语

综上所述,冷战期间,台湾政府利用其做为与日本有邦交的正统地位,为了维持其对华侨学校正当的指导,而极力展开推行了争夺侨校的政策。实行争夺侨校的政策,背后存在几点特征:一、台湾政府充分利用了其有邦交的正统地位。最典型地表现在对横滨学校事件的处理上。政府不仅出动了自己的海军,还动员了日本警察。二、国家在战后重建中的台日双方国家间,存在着外汇不可缺少及其他贸易结汇上的制约。因此,不管是额外的或是额内的贸易,通过政府给予的香蕉苹果等进出口配额的特权,使海外侨校得到了经济上的缓解和经营上的完善与健全。三、为了管理侨民,最有控制效果的政府行为是停发护照、不给证件等措施⁸⁰。牵制亲共侨民、开除左倾教员等,均用到不发华侨登记证等的手段。如果说1952年到1956年左右为止的北京政府通过廖班争取华侨回国的政策奏效,那么,1956年以后台湾政府利用种种正统政府的地位和分配资源的特权展开的争取侨校的政策,除了神户侨校成为一个

79 丘念台《对在日匪共活动之管见(1956.0417)》,外交部档案11-EAP-00550《共匪在日活动》,第27页。

80 《关于本届辖区各华侨总会改选》、《辖区各华侨总会改选情形及结果》、《大阪侨务》,第127、137页。吊销“附匪”份子侨民登记证等例子不胜枚举。

例外,其他可以说基本上成功了。

1952年横滨的华侨学校分裂之后,各地的华侨社会也随之陆续发生左右两派的斗争。京都中华学校脱离了台湾政府的指导,然而其实是被放弃而最终告停。大阪中华学校以免结汇香蕉输日,借助于政府的中介,实现了争夺政府配额特权的优待,成功地实现了校舍的重建和面向未来基金的运作。其实,在完全受管理之前的大阪中华学校建校委员会委员长王汝钧曾说过“学校是我们的,不属国民政府,以后我们继续中立,谁也别来管”等语。可以说,王委员长用这些话,是为了威迫政府最终支持侨校。东京中华学校虽经过校董会历次的改组,也得到政府的照顾,终于实现了校舍的扩建。但即使得到了政府的补助,大阪和东京侨校的建筑费用不少部分实际上是来自侨民的捐款。台湾政府与神户中华同文学校之间,因为校长和教务主任的人事和校舍重建的问题发生严重纠纷,董事长被迫提出辞呈,重新成立学校法人理事会。从此以后,神户侨校名目上虽还通过领事馆、留日神户华侨总会等,表面上属于台湾政府侨务系统之下,而事实上通过放弃校董会制度,它脱离了政府和国民党直接的指导。但该校也并不完全认同北京政府,直到1972年的台日断交为止。可以说,神户华侨采取的态度是不偏“共”、也不偏“国”的华侨“自律”路线。本文尽量利用多方资料,以侨校问题为主题,解剖了冷战的对立关系达到最高峰时期的日本华侨社会。

1950年代冷戦期国共両陣營が繰り広げた日本華僑の争奪戦

要旨：冷戦下、国共両陣營の対立抗争は、中国国外の華僑学校をめぐり最も熾烈に展開された。日本に現存する五つの全日制華僑学校がそれぞれ北京系、台湾系というレッテルを張られた契機は、1950年代の争奪

戦の結果に由来する。

戦時中一時閉鎖のやむなきに至っていた各地の華僑学校は終戦直後に再開した。この時期、日本政府も、内戦の結果台湾に退避した中華民国政府もともに厳しい外貨管理と管理貿易の体制を敷いていた。それ故に、バナナの輸入やリンゴの輸出の特権を在日華僑に付与することで、これまでになく本国から華僑社会に対する政治介入が可能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1952年の学校事件による横浜華僑学校の分裂。翌年台湾政府による東京中華学校への人事指導と1956年の董事会改組に続き、台湾政府は華僑社会への介入を試みたが、1958-59年神戸中華同文学校の校舎再建運動は、華僑社会が台湾政府の支援と指導を謝絶する形で決着した。本論文は、直前に起こった大阪中華学校校舎再建の問題を取り上げ、台湾バナナの輸入特権の配当によって得た利益がそれを実現させたことを検証し、東京・横浜・神戸・大阪の華僑学校の校舎の再建と相互に緊密に関連していたことを指摘する。つまり、華僑には伝統的に華僑学校を自主運営する「中立」的自主路線があったことを再確認しつつ、この時期には限られた政府の補助金資源をめぐり、横浜・東京・大阪・長崎・神戸の華僑学校には競合する側面が認められる点を明らかにした。

The Battle betwee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for Obtaining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 under the Cold War in the 1950s

Abstract: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the fiercest in

taking over Chinese schools overseas. In Japan, among the five existing full-time Chinese schools, two were regarded a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while three were considered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following the result of the 1950s conflict.

During World War II, most Chinese schools were forced to close; however, education was resumed after the end of war. Not on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drawn to Taiwan, but als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d no choice but to maintain the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as well as the foreign trade control system. As such,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was able to exercise its privileges to endow the overseas Chinese with the right of importing bananas from Taiwan and exporting apples from Japan.

The school Incident of 1952 eventually split the Yokohama Chinese School into two. The following year,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ntervened in the personnel affairs of the Tokyo Chinese School, and in 1956,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as completed according to Taiwan's government. The movemen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Kobe Chinese School building around 1958 eventually ended up using a self-reliant method, without obtaining assistance from the govern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how the Osaka Chinese School achieved its rebuilding by importing bananas, which influenc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okyo Chinese school. The Chinese schools of Yokohama, Tokyo, Osaka, Nagasaki, and Kobe, were in reciprocal rival relationships in their need to acquire governmental support.